



入选『十三五』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

上
卷

儒

TUSHUO
ZHONGGUO
RUXUESHI

图说中国儒学史

杨朝明·主编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上
卷

图说中国儒学史

杨朝明·主编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图说中国儒学史：全3卷/杨朝明主编.——济南：
济南出版社，2016.12

ISBN 978 - 7 - 5488 - 2437 - 4

I. ①图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儒学—思想史—中国—
图解 IV. ①B222. 05 - 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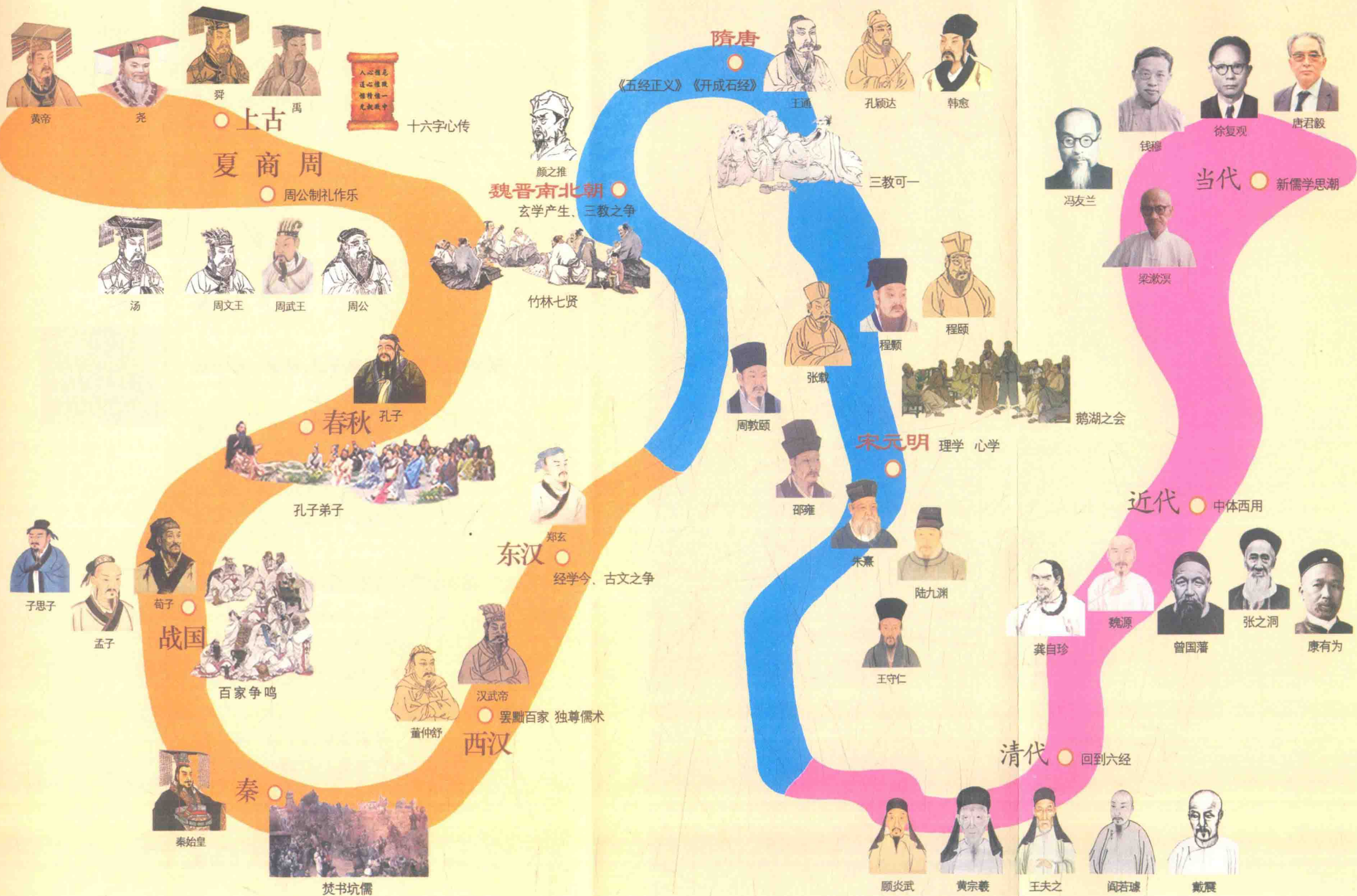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2386 号

出版人 崔 刚
丛书策划 冀瑞雪
责任编辑 冀瑞雪 冯文龙
李廷婷 孙育臣
图书审读 颜炳罡 林存光
封面设计 张 金
版式设计 李海峰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 (250002)
编辑热线 0531 - 86131747 (编辑室)
发行热线 86131747 82709072 86131729 86131728 (发行部)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 170mm × 240mm 16 开
印 张 56
字 数 930 千字
印 数 1 - 5000 册
定 价 298.00 元 (全三卷)

(济南版图书，如有印装错误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：0531 - 86131736)

中国儒学史发展脉络图





导言

孔子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
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，儒学影响中国既深且广。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，他继承中国上古三代以来的文化，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；孔子以后，历代儒家“宗师仲尼”，不断对孔子学说进行阐发、弘扬与提升，这就是中国儒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。

如果找一个最能代表“中国”的人，毫无疑问，这个人非孔子莫属！到目前为止，世界上大概还找不到第二个人，像中国的孔子这样，在两千五百多年的日子里，受着亿万人的关注。从孔子在世时开始，孔子和他的思想学说便与中国社会发生了密切联系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，孔子儒学与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孔子更多的则是受到世人的尊敬；而到了近代中国，孔子却遭到了怀疑以至批判，他竟然成为“封建”“落后”的代名词。

当我们逐渐走出迷茫，慢慢找回民族文化自信的时候，回顾孔子与他之后两千五百多年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，这无疑是认识中国儒学发展脉络的关键所在，我们亦会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。

一、孔子及其思想的形成

20世纪30年代，著名学者柳诒徵说：“孔子者，中国文化之中心也。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。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，赖孔子而传；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，赖孔子而开。”孔子站在时代的高端，集上古三代文化之“大成”，深刻总结历史，反



先师孔子行教像

思现实，使其核心理念具有了“永恒价值”与“超越意义”。

孔子的远祖微子本是商纣王的庶兄，商亡后被封于宋，因为宋国内乱，后代乃避难奔鲁。孔子的父亲以勇力著称，因战功封鄫邑大夫，因此，人们一般说孔子出身于“没落贵族”。但孔子早年丧父，家境衰落，所以孔子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^①他管理过仓廩，也做过管理牧畜的小官……

孔子的人生经历使他一生好学，至老仍孜孜不倦。他博学多闻，早早便确立了人生方向，并收徒授业，吸引了大批青年来学。孔子有教无类，与弟子教学相长。他曾为政仕鲁，后来又周游列国。无论得志还是失意，孔子念念于怀的总是使天下有道，礼

乐大行，社会安宁，人人安康。

孔子自称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他了解和熟悉唐虞、三代制度，在他心目中，“五帝”“三王”具有崇高德行，他对尧、舜、禹、汤赞不绝口，对周代的文王、武王、周公表彰更多，不断称颂。孔子以继承三代文明为己任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进行了“创造性转化”。

孔子所在的鲁国是周公封国，周公是周朝礼乐统治秩序的奠基人。周文化乃是“损益”夏、商文化而来，经过周公“制礼作乐”，礼乐制度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章。鲁国文化与周文化一脉相承，鲁国全盘继承了周人的礼乐文化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。所以，当春秋末年“礼崩乐

^① 《论语·子罕》。

坏”之际，孔子有条件更好地收拾遗散，整理诗、书、礼、乐，研究《周易》，制作《春秋》，集合周代典章文籍、伦理道德，逐步构建起他的儒学思想体系。

二、孔子学说走向“独尊”

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的“百家争鸣”中，儒家似乎只是各家中的重要派别之一。孔子在政治舞台间奔走时，也受到当政者的注意。孔子曾为鲁国中都宰、司空和大司寇；齐景公想“以尼溪田封孔子”^①；卫灵公给孔子“粟六万”^②；楚昭王曾想“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”^③。许多在位者遇到重大问题也往往向孔子请教。

但是，当时的乱世列国纷争，崇武尚霸，孔子的主张显得迂阔，人们不能够理解孔子。虽然孔子毕生致力于宣扬其理论学说，凄凄惶惶，四处奔波，却到处碰壁，终不见用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孔子学说政治命运不济，然而，它体大思精，其影响注定要不断扩大。孔子弟子毕竟更了解孔子，更深切感知了孔子学说，认为孔子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”^④，说孔子像日月“无得而逾”。人们感慨地说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^⑤就连反对孔子学说的墨子也说“博于诗书，察于礼乐，详于万物”^⑥。孔子去世后，他的弟子流散四方，将孔子学说传播到各地，还出现了像孟子、荀子这样的儒学大师。大量新的出土材料证明，战国时期，儒家的典籍著作甚至在南方的楚国都得到了传播。

秦代，儒家思想继续影响着社会。秦以法家思想变革社会，迅速强大，秦统一后，统治者试图建构起与统一大帝国相适应的统治思想体系。然而，秦始皇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官僚机构建设上面，在施政定制上，基本以法家思想为依据，也兼采了阴阳等各家的思想。秦设博士官，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

①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

②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

③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

④ 《论语·子罕》。

⑤ 《论语·子罕》。

⑥ 《墨子·公孟》。



秦灭六国形势图

百家均可立为博士。终秦之世，儒生的活动史不绝书。因为儒学之盛影响到了政治，才出现了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。这种“焚”“坑”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限制儒生，使其就范，并非要消灭儒学。因为焚书的对象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“百家语”，即使《诗》《书》，在禁民藏时，还允许秘府收藏、博士掌握。

“焚书坑儒”毕竟使儒家等各派思想遭到一定的禁锢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六引《异苑》曰：“始皇既坑儒焚典，乃发孔子墓，欲取诸经传。”孔子地位明显下降，儒生的境况也急转直下，他们不敢公开传道授学。这种文化高压政策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怨愤。当陈胜起而反秦时，儒生们便纷纷加入到了反秦的行列之中。

楚汉战争后，刘邦取得了天下。这位起于小吏的农民领袖，开始的时候并没把儒生放在眼里。当战争烟尘散尽后，面对残破的社会局面，刘邦等汉初君臣不能不思考秦“二世而亡”的教训。陆贾因此撰成《新语》，认为秦“用刑太急”，不知教化，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。人们也对儒学与政治

的关系进行反思，叔孙通认为：“夫儒者，难与进取，可与守成。”^① 这种观点很具代表意义。叔孙通“征鲁诸生”，参秦仪，采古礼，制汉仪，使刘邦感知到“为皇帝之贵”^②。从此，孔子与儒学开始受到重视。汉高祖还“以太牢祀孔子”，开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。

汉初，社会凋敝，百业俱废，不能不取用“清静无为”的黄老思想。而汉高祖的尊崇，使儒家与黄老思想并行发展。从汉朝立国到汉景帝，儒学和儒生的地位虽不太高，但由于诸侯割据势力逐渐增大，黄老之术越来越力不从心，而客观上又要求加强思想统一，儒学遂更受重视。文、景之后，政府渐开献书之路，有意识地搜求旧典，发掘古籍。汉初古墓出土的书籍中，儒家经典占据多数，这是汉初儒家境遇的真实反映。

汉初统治者重视黄老学说，但黄老思想对“礼”的蔑视，也容易构成对社会的威胁，而且其因循的成份较多，虽可成功于一时，却不能保全于久远。相反，儒家“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”^③的特点，却可以巩固政治秩序，维护社会伦常。所以，汉初并非以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或定其一尊，而是利用各家而偏重儒、道。但有一点很明确，汉初对黄老的“尊”

《易大传》：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涂。”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务为治者也，直所从言之异路，有省不省耳。尝窃观阴阳之术，大祥而众忌讳，使人拘而多所畏；然其序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；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，不可易也。墨者俭而难遵，是以其事不可遍循；然其强本节用，不可废也。法家严而少恩；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；然其正名实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赡足万物。其为术也，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，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则不然。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，

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7637

主倡而臣和，主先而臣随。如此则主劳而臣逸。至于大道之要，去健羡，绌聪明，释此而任术。夫神大用则竭，形大劳则敝。形神骚动，欲与天地长久，非所闻也。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。”

① 《史记·刘敬叔孙通列传》。

② 《汉书·叔孙通传》。

③ 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。

并不是建立在“抑”儒的基础上。

秦的统一，使各民族相互融合，也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综合。汉代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，连汉武帝格外器重的董仲舒也“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”^①，具有显著的综合色彩。加强中央集权，实行专制统治，当政者更偏爱法家的“尊君抑臣”等思想，他们王、霸相杂，儒、法并用，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^②。

政治一统要有思想统一与之相适应。儒者在汉初十分活跃，他们著书立说，授徒讲学，重视儒家经典，从师习读成为普遍风尚。如河间献王经术通明，积德累行，网罗了大批儒生。经学大师董仲舒为给汉武帝的经济、政治等政策制造舆论，便结合阴阳五行，对孔子学说进行了系统修正和改造。当汉武帝不允许师有“异道”、人有“异论”的局面存在时，儒术便自然上升到“独尊”的地位。由此，诸子百家“并进”归于“一统”，它们都不得不改贴上“六艺之科，孔子之术”的标签，被纳进儒学体系之中。

三、经学时代的孔子思想

儒学思想的载体是“六经”，“经学”就是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之学。经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子夏和荀子，但直到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，设置五经博士，以“通经”作为进选人才的标准，经学才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。从此，其盛衰、分合、争辩往往与政治相关联。

两汉是经学兴盛时代。秦朝焚书和秦汉之际的动乱，使许多儒家著述遭到损毁，汉初兴复文化，一些典籍只能赖年长儒生的记诵，用汉代的隶书写定，这便是今文经。西汉时期是今文经学的一统天下。后来，山间屋壁发现一些战国古文典籍，自西汉末年始，古文经学兴起，到东汉巾叶，逐渐有取代今文经学地位而跃居独尊之势。今、古文经学之间斗争激烈，直到东汉末年郑玄注《三礼》，杂糅今、古文两派学说，这场斗争才告平息。

战国时期，儒学的影响主要在齐、鲁地区，由于王、霸思想的不同以及

① 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
② 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

齐、鲁民俗的差异，反成为经学内部派别分立的因素，于是有了所谓“齐学”与“鲁学”的称谓。齐地多神仙方士，盛行阴阳五行学说。秦始皇、汉武帝都抵御不了“万寿无疆”的诱惑，迷信阴阳五行和神仙方术，派人入海求仙，客观上促进了神仙学说的发展。汉初儒、道杂糅，阴阳五行思想也有相当的市场，甚至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，在本质上也是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加强思想统治。

汉武帝时期，董仲舒地位很高，人们把他看成是“汉代的孔子”。他讲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，思想体系也是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作为《公羊》学大师，董仲舒把《春秋》也阴阳五行化了，他以阴阳五行理论证明上天主宰世界，也主宰人类社会。他认为“王者承天意从事”，“天”经常用符瑞和灾异来表示希望与谴责。当然，统治者的兴趣在于“王者承天之意”的“君权神授”理论，而对大讲灾异以及所谓“天谴”十分反感。董仲舒认为，历史朝代循环更迭，新的王朝重新享有天命，就应“改正朔，易服色”。他结合阴阳理论，对孔子学说进行了一次系统修正和改造。

在今文五经中，《公羊春秋》强调“大一统”和君臣大义观念，非常适合汉武帝维护统一和加强皇权的需要。公孙弘以儒生而登丞相，董仲舒“罢黜百家”之建议被采纳，他们皆治《公羊春秋》学。武帝时，博士教授学生每经十人，全国博士弟子共五十人。这些博士弟子可以“复其身”，免除徭役，成绩优良的还可以做官，故士人竞相为之。昭帝时，博士弟子增到一百人，宣帝时更增至二百人。宣帝时博征群儒，考定五经于石渠阁。宣帝以前，许多儒生以儒士居丞相、权臣之位，朝廷公卿均从经术而进，“上无异教，下无异学”，连皇帝诏书及群臣奏议都援引经义为依据。到元、成之时，能通一经即“复身”免役。

在本质上，汉代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，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，偏重于微言大义。王莽虽是古文经学的政治支撑，但他却主要利用了今文经学家所制造的种种理论，如“汉运中衰，当让国传贤，易姓受命”，“汉为尧后，当火德之运”，以及阴阳灾异和符命谶记之说等。而在改制时，他又援据经

义，或用今文经传，或用古文经传，或杂用今、古文经传。

政治的需要，使人们着重发挥经文“大义”。后来，天文学进步，大讲灾异行不通了，于是东汉又讲讖纬，假托天神或圣贤之言，诡为隐语，以示凶吉之兆。光武帝刘秀深信于此，不仅为其代汉制造舆论，还遇事“多以决定嫌疑”^①。当时有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《孝经》七经之纬，是为《七纬》。其时，五经之义皆以讖决，于是五经为外学，七纬为内学，遂成一代风气。这样，孔子被捧上神位，

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：“多以决定嫌疑。”

成了被神化的中心人物，孔子逐渐成为能预知来世的“神人”。

随着今文经学失去了生命力，古文经学于西汉末年兴起。今文经学以古文经为伪作，不足凭信。哀帝时，刘歆建议将古文经《左氏春秋》《毛诗》《古文尚书》《逸礼》列于学官，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。但古文经学势力不断发展，到东汉中叶后，古文经学就压倒了今文经学，古文经学兴盛起来。

古文经学家斥责今文经学家、讖纬的妖妄，注重研究文字，认为训诂不明，经义不彰。与今文经学重现实政治不同，古文经学主张恪守经传原意。今文经学推崇神化孔子，讖纬神学把孔子捧上神位，在皇权支持下，白虎观会议又将孔子的学说宗教化，但儒学毕竟没有成为正式的宗教，这与古文经学家对灾异、讖纬学说的指摘有重要关系。

（一）詭誕時，令賈人不得衣絲絮車，市井子孫不得賣為吏。
（二）中家猶中等也。保校，可保信也。
（三）枚舉謂舉錢輸息利也。東觀記曰：「中家子為之保校，受計上，誣是情狀，譬若匿債，營利分利也。」
（四）界，與也。東觀記載讖言曰：「賈人多通修築之物，羅織粉飾，惟縱玩好，以誣人耳目，而竭盡其財。是為下樹者，雖則戲笑本也。求人之微約富足，何可得乎？夫俗難卒變，而人不可移化。宜抑其路，使之稍自衰焉。」并書必錄則戲笑本也。
二反。
又見法令決事，輕重不齊，或一事殊法，同罪異論，姦吏得因緣為市，所欲活則出生議，所欲陷則與死比，是為利開二門也。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，校定科比，（一）一其法度，班下郡國，蠲除故條。如此，天下知方，而獄無怨濫矣。（二）
（一）糾糾事條，比謂類例。
（二）方，例法也。
書奏，不省。
是時帝方信讖，多以決定嫌疑。又驕貴少薄，天下不時安定。譚復上疏曰：
臣前獻啓言，未蒙詔報，不勝憤懣，冒死復陳。愚夫策謀，有益於政道者，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。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，觀先王之所記述，咸以仁義正道為本，非有奇怪虛誕之事。蓋天道性命，聖人所難言也。自子貢以下，不得而聞，況後世淺

無謂漢書列傳卷十六上

九五九

① 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。

四、“三教之争”中的孔子思想

东汉后期，社会长期动荡，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，西汉以来儒家学说在思想界的一统局面发生了动摇，于是玄学产生。佛教、道教流行，对魏晋隋唐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。然而，总体看来，儒学与玄学、佛道并没有达到不可两存的地步，儒家的纲常名教仍是立国之本，儒家的天命论仍是皇权的支柱，佛教、道教只能作为一种精神统治的辅助工具而存在。

汉末，经学衰落，郑玄遍注群经，但他是大学问家，却不是大思想家，不能为变化了的时代提供新的思想体系。魏晋时期，王肃向郑玄的权威发起攻击，经学进入王、郑对抗时期。但王肃同样没有提出新的哲学体系，他最多算是对郑玄的修正与补充，理论上超出郑学的任务便由玄学承当了。

玄学用道家思想解说儒家经典，可说是一种义理经学。玄学的重点在于发挥注者本人见解，而不是疏通经义，是揉和儒、道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。魏晋玄学盛行，清谈成风，士大夫把道家的《老子》《庄子》和儒家的《易》称为“三玄”。文人士大夫或厌世纵酒，斥责儒、道，或寄托于老、庄之虚无。有人痛骂仁义礼法，认为名教是“乱危死亡之术”；有人提出要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对儒家的名教纲常展开猛烈抨击。

玄学盛行时，人们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儒学。曹操当政时曾下《举贤勿拘品令》，宣称可以任用“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”的人，但他也认识到“承平尚德治，乱世赏功能”，所以谈到培养下一代的问题时他曾说：“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，吾甚伤之”。他下《修学令》，希望“先王之道不废，而有益于天下”。继起的晋代司马氏更标榜以孝道治国。有的玄学家批判儒家“名教”，也都是调和而不否定，还宣称“名教”出于“自然”，要求人们“安分”“顺命”，肯定儒家伦理纲常合乎人性自然。

魏晋隋唐时期，儒学与佛、道长期并存，互相斗争融合。佛教是外来宗教，在共争正统地位的斗争中，儒、道往往结成联盟。除道教反佛外，学者们也从儒家的角度反对佛教，如宋末顾欢《夷夏论》说佛教“剪发旷衣”，“狐蹲狗踞”；“下弃妻孥，上绝宗祀”，与华夏礼俗不合。唐初的傅奕斥责僧

徒“非孝无亲”，斥佛教为“无父之教”。中唐以后，韩愈也指责佛教，希望发扬儒家之道。建立了从尧、舜开始到孔、孟时代相传的儒家道统，以此论证儒家的正统地位。

社会乱离之时，人们寄希望于来世，推动了佛教的流行。佛教让人们忍受现世苦难，也给贵族阶级以美妙幻想，使不少统治者提倡佛教。然而，佛教盛行使佛寺遍地，上百万劳动力隶籍佛寺，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主势力恶性膨胀，政府兵源、财源枯竭。政府不得不“求兵于僧众之间，取地于塔庙之下”^①，出现了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的“三武灭佛”，禁断佛教，没收财产，僧尼蓄发，以充军国之用。有人看到“民焉不事其事”和佛、道耗费大量财富，也大力主张除去佛教，益国足兵。

儒学适合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，儒家思想也得了统治者的支持，由此，佛、道二教便向儒学妥协，与儒学相互交融。道教思想在批判、斥责原始道教的同时，把许多儒家伦理教条变成贵族道教的教义，如寇谦之教人“不得逆君王”，“于君不可不忠”等，与儒家忠君尊王思想一致。唐初尊重和利用佛教，但同时抬高道教，并用儒学的君父之义加以约束，使之纳入“周、孔之教”的范围。当时的佛徒可能有的已意识到这一点，如在唐代，华严宗的宗密曾说“佛且类五常之教，令持五戒”^②，将佛教的“五戒”比附“五常”，以显示佛徒也拥护儒家的伦常道德。他们还有所谓《父母恩重经》《孝子报恩经》等，声称“孝道”乃“儒释皆宗之”。佛教的重要支派禅宗也简化教义和修行方法，吸收儒家的思想因素，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，逐步从外来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。

魏晋到隋唐时期出现了“三教可一”等主张，有人认为“法无内外，万善同归；教有深浅，殊途共致”^③，而立足点仍是儒家。在政治上，许多帝王利用佛、道思想治国，却以儒家思想为其根基。如梁武帝年轻时修习儒业，

① 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四。

② 《原人论》。

③ 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一二。

中年信仰道教，即位不久又宣布改信佛教，但儒家思想毕竟是他思想的主流。即使由游牧民族而后入主中原的鲜卑族，在汉化过程中也大量吸引汉族士人参政。北魏孝文帝崇尚经术，重儒兴学，还亲至鲁城祀孔。唐太宗更说：“朕今所好者，惟尧舜之道，周孔之教，以为如鸟有翼，如鱼依水，失之必死，不可暂无耳。”^①

五、孔子思想在理学时代

宋初儒者批判佛、道，基本是对韩愈的重复和继续。但后来，理学家则开始融汇儒家的礼法纲常和道家与道教的宇宙生成、万物演化以及佛教的思辨哲学，构思出既是儒家但又不是原本儒家的理学哲学体系，这种新的儒家学说便是宋明时期的理学。

在宋朝，“三教”融合趋势更为明显，不少理学家都出入佛、道。如张载“访诸释、老之书，累年尽究其说”^②；程颢则“泛滥于诸家，出入于老、释者几十年”^③；朱熹亦自称其“出入释老者十余年”^④。宋儒“入”释、老的目的却在于“出”释、老，他们都主张变革图强，以为佛、道不能强兵富国，应摒弃佛、道，振兴儒学。连一些佛徒也看到了“力扶姬孔”的必要性，认为“非仲尼之教，则国无以治，家无以宁，身无以安”^⑤，倡导以“宗儒为本”，佛教出现了儒学化趋势。

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，他在当时儒、释、道思想趋于融合的形势下，对《老子》《易传》《中庸》等思想熔铸改造，从宇宙生成、万物变化到建立人伦道德标准，都作出了概括。后来经朱熹等人解说之后，周敦颐的学说克服了玄学、佛、道空无本体的理论局限，建立了以“理”为本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。继周敦颐和二程之后，朱熹建立和发挥了“理一分殊”学说，使传统儒学的哲理化迈出极重要的一步；尔后，又把三纲五常、忠孝

① 《贞观政要》卷六《慎所好第二十一》。

② 《近思录》卷十四《圣贤气象》。

③ 《近思录》卷十四《圣贤气象》。

④ 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八《答江元适》。

⑤ 《续藏经·闲居编·中庸子传》。

节义等政治伦理道德说成至高无上的天理，主张人们“去人欲，存天理”，君、臣、父、子都要依照本分，按“天理”行事。

宋明理学家关心现实社会问题，也注重“天之何物”等问题的思虑，建立了他们的理气、道器理论，把中国哲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宋明理学在哲学上臻于成熟，它是宋代新儒学运动的主流，代表着宋明儒学的时代精神和理论精华。相比于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，朱熹等人更加高明地把“性”“理”作为政治社会伦常的根据。朱熹说：“性是太极浑然之体，本不可以名字言，但其中含具万理，而纲领之大者有四，故命之曰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。”^①他把仁、义、礼、智提到了世界本原、万物本性的高度。理学是儒家思想接受异域佛教文化、融汇道教思想的结果，这种开放精神也是儒学的生命力所在。



《御制重修孔子庙碑》

在理学兴盛时期，宋、元、明诸朝都注重尊孔崇儒。以对孔子后裔的封赐为例，北宋以前相袭延续的“侯”“公”基本属于“荣誉”性的虚爵。北宋仁宗至和二年（1055年），封“孔子后为衍圣公”，以后，“衍圣公”在不断加码的“推恩”“优渥”下，成为炙手可热的不衰显贵。历代皇朝“崇倡儒教”“优渥圣裔”，其着眼点在于孔子“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”^②。明宪宗成化四年（1468年）的《御制重修孔子庙碑》，明确道出了孔子

① 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五十八《答陈器之》。

② 《朱元璋与孔克坚、孔希学对话碑》。